

第八章 結論

第一節 評價

早在《史記·卷一百二十一·儒林傳》就曾云：「漢興至於五世之間，唯董仲舒名為明於《春秋》。」¹，而《漢書·卷二十七上·五行志》中也稱：「董仲舒治《公羊春秋》，始推陰陽，為儒者宗。」²，故可知像董仲舒這樣一代大儒，在各方面都有其一定的影響，而後人必對其有所評論。上述曾提及劉向、王充就對董仲舒在政治上的影響有所肯定外，如三國何晏也云：「儒雅博通，莫賢乎董仲舒。」³，唐代的柳宗元就對於董仲舒三代受命之符的說法有所批評，其云：

臣所貶州流人民吳武陵為臣言：「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，誠然非邪？」
臣曰：「非也，何獨仲舒爾，自司馬相如、劉向、揚雄、班彪、班固，皆沿襲嗤嗤，推古瑞物以配天命，其言類淫巫瞽史，誑亂後代，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，顯至德，揚大功，甚失厥趣。」⁴

認為除了董仲舒以外，司馬相如、劉向、揚雄、班彪、班固都是推古以配天命，對後世造成錯誤的影響。

北宋的歐陽修則對董仲舒有褒有貶，其云：

董生儒者，其論深極《春秋》之旨，然惑於改正朔，而云王者大一元者，牽於其師之說，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。惜哉！惜哉！⁵

歐陽修雖稱讚董仲舒治《公羊傳》之功，卻反對其天人感應符命之說。對此南宋

¹ (漢)司馬遷：《史記》(臺北：藝文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，2005年2月初版4刷)，頁1273。

² (漢)班固：《漢書》(臺北：藝文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，1996年8月)，頁600。

³ (宋)李昉：《太平御覽·卷四百四十七·品藻下》(臺北：大化書局，1977年5月初版)，頁2057。

⁴ (唐)柳宗元：《柳河東集·卷一·貞符》(臺北：中華書局《四部備要》據三徑藏書本校刊，1965年)，頁16-17。

⁵ (宋)歐陽脩：《歐陽文忠公文集·卷七十三·書春秋繁露後》(臺北：臺灣商務書《四部叢刊》縮印元刊本，1975年)，頁545。

的黃震卻不贊同歐陽修的評論，其云：

漢世之儒，惟仲舒仁義〈三策〉炳炳萬世，曾謂仲舒之《繁露》而有是乎？歐陽公讀《繁露》不言其非真，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，且有惜哉惜哉之嘆。夫仲舒純儒，歐公文人，此又學者所宜審也。⁶

黃震認為歐陽修只是文人，並不理解董仲舒思想的長處，故站在純儒家的立場，給予董仲舒高度的評價，就如程明道所言：「漢儒如毛萇、董仲舒，最得聖賢之意，然見道不甚分明。下此，即至揚雄，規模窄狹。道即性也。言性已錯，更何所得？」⁷，然黃震也對《春秋繁露》中的讖緯思想有所貶低。此外，南宋的趙彥衛在《雲麓漫抄》中也曾云：

董仲舒，劉向於五行災異，凡一蟲一木之異，皆推其事以著驗。二子漢之大儒，惓惓愛君之心，以為人主無所畏，惟畏天畏祖宗，故委曲推類而言之，庶有警悟。學者未可遽少之。⁸

認為董仲舒、劉向雖以五行災異來談論政治，實際上是希望能對國君有所牽制，故不應輕易的就對其否定。由上述學者的說法中，可知當時的學者雖對董仲舒有所推崇，卻對其災異讖緯的部份有所批評。

至清代盧文弨除了對《春秋繁露》作注解外，更認為董仲舒用陰陽五行等神學以論證其儒家仁義道德、綱常名教，應譽為正統儒家，連清代經學家皮錫瑞也云：「孟子之後，董子學最醇」⁹也。而民初的康有為則認為：「孔子之文傳於仲舒，故所發言軼荀超孟，實為儒學群書之所。若微董生安從復窺孔子之大道哉」¹⁰，梁啟超則是從著述的部份來讚揚董仲舒，其云：

⁶ (宋)黃震：《黃氏日鈔》(北京：北京圖書館《讀書記四種》，1998年9月北京1刷)，卷56，頁757。

⁷ (宋)程頤、程顥：《二程全集·卷一·端伯傳師說》(臺北：中華書局《四部備要》據江寧刻本校刊，1965年)，頁6。

⁸ (宋)趙彥衛：《雲麓漫抄·卷十四·讀諸子二》(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，1983年)，第864冊，頁399。

⁹ (清)皮錫瑞：《經學通論·春秋》(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4年12月臺影印初版)，頁4。

¹⁰ 康有為：《春秋董氏學·自序》(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9年1月初版)，頁2。

江都《繁露》，雖以說經為主，然其究天人相與之故，衍微言大義之傳，實可為西漢學統之代表。……若是乎兩漢之以著述鳴者，惟江都、龍門二子，獨有心得，為學界放一線光明而已。¹¹

認為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為西漢學統的代表，也是兩漢間著述最為特殊的，故可知其對董仲舒在著述部份的推崇。

近代學者如徐復觀就認為董仲舒「他成為第一個受了專制政治的大欺騙，而自身在客觀上也成了助成專制政治的歷史中的罪人；實則他的動機、目的，乃至他的品格，決不是如此。所以這是思想史上很難處理的一位大思想家。」¹²，筆者也以為董仲舒雖造成後世一些不好的影響，然其本意非為如此，故討論董仲舒時並不能僅討論缺失的部份，更重要的是其背後真正用意，才是解釋董仲舒思想最好的方法。而張立文也站在氣論的立場對董仲舒有所評價，其云：

他提出「元氣」的範疇，認為陰陽之氣、天地之氣、四時之氣都是自然之氣，是構成天地人物的本始本質，具有合理的因素。只是在天人感應觀念的束縛下，氣被異化為天施行賞罰、體現意志的手段，這是他的局限性。如果說《淮南子》是以道加為宗，通過雜揉百家來建構他的哲學體系的。那麼，董仲舒則是以儒家為宗而綜合百家來構築他的哲學體系的。董仲舒哲學氣論服從於他整個哲學思想的宗旨，具有他自身的時代意義，對中國哲學範疇的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。¹³

筆者以為，張立文的說法十分中肯。董仲舒的思想理論確有矛盾之處，也有過於牽強之處，但仍深具當時氣論的時代特色，也為後世氣論展開更寬敞的道路。

第二節 價值

董仲舒雖為漢代大儒，但在《史記》與《漢書》中的記載並不詳細，而使其

¹¹ 梁啟超：《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71年10月臺5版），頁52-53。

¹² 徐復觀：《兩漢思想史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76年6月初版），頁298。

¹³ 張立文：《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書—氣》（臺北：漢興書局有限公司，1994年5月），頁69。

生平有很大的爭議。此外，《春秋繁露》一書因版本流傳的關係，而是否為董仲舒所作也受到很大的質疑。然董仲舒受到當時大環境的影響，以儒家為出發點，融合了黃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陰陽家的思想，而為漢代儒學開出一條不同以往的學術發展。而《春秋繁露》中的陰陽五行的觀念、天人感應之說、對人性的討論，或是《春秋》之學都對後世有很深遠的影響，實為研究漢代氣化論不可或缺的一環。

在董仲舒的思想體系下，除了《春秋》之學外，氣論也是值得關照的一點。董仲舒雖未明言「元氣論」，但在《春秋繁露》一書中已有出現元氣的概念，認為「元者萬物之本。人之元在焉。安在乎？乃在乎天地之前。」¹⁴，元氣是萬物之本，是生於天地之前的，而此元氣又可「分為陰陽，判為四時，列為五行。」¹⁵，故董仲舒就以陰陽、五行為兩大詮釋系統，並透過四時轉變而將陰陽與五行兩系統相結合，架構出一套以氣為主軸的宇宙論。而這氣化宇宙論不僅表現出氣化的整體觀，也表現出其中的氣化流行是動態的、是循環不已的，筆者以為更是以螺旋式不斷前進的，這也就是董仲舒氣論的特色。雖在漢代氣化論中，各家氣論皆有所不同，但都是以表現那無限的氣化整體觀為主，故利用各個層面的具體事物來與氣化流行作連結，欲透過無限多的具體事物來對無形的氣化有所掌握，而董仲舒的氣論也不例外。

在元氣的觀念下，董仲舒提出了涵括多重意義的「天」，並因受到當時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影響，將人與天做了緊密的結合，其中又以君王與天的關係最為密切。董仲舒先利用「人副天數」的觀念，透過人的身體、感官、情緒都與天相同，再延伸到「官制象天」的部份，認為君王設立官制也應該效法天之數，如天有日、月、星三光，國君就應該有三公來輔佐朝政。並認為天人之間是以氣相感相通，認為「天地之符，陰陽之副，常設於身，身猶天也，數與之相參，故命與之相連也。」¹⁶，既然天人是相連結的，那也就會「美事召美類，惡事召惡類，類之相應而起也。」¹⁷，故上天會因未君王的行為好壞而有所表現，如果君王順天而行

¹⁴ (漢)董仲舒：《春秋繁露·卷五·重政》(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《四部叢刊》影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武英殿聚珍本，1975年臺3版)，頁29。此段殿本放於〈重政〉，但今據蘇輿所云：「第一、二節似與篇名不相應。義見〈玉英篇〉。」，故筆者將此段放於〈玉英〉中。(清)蘇輿：《春秋繁露義證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年8月北京第3刷)，頁147。

¹⁵ (漢)董仲舒：《春秋繁露·卷十三·五行相生》，頁73。

¹⁶ (漢)董仲舒：《春秋繁露·卷十三·人副天數》，頁71。

¹⁷ (漢)董仲舒：《春秋繁露·卷十三·同類相動》，頁71。

就會有祥瑞之兆的出現，反之則有災意之象以示譴告。而董仲舒在這樣以君為主的前提下，提出了「屈民而伸君，屈君而伸天」¹⁸的說法，為君王樹立了極為崇高的地位。董仲舒雖在君王之上設立了「天」，欲以「天」來對君王有所牽制，但成效不彰而造成君王以此為由來欺壓百姓，這也是董仲舒所始料未及的，非董仲舒的原意。

此外，董仲舒也在「天人同類」的概念下，並融合孟、荀人性論而發展出特殊的人性論。董仲舒認為人性也是由天而來，是自然而生的，故天有陰陽二氣，人也就會有仁貪二性，而人必須藉由心來認之氣化流行的規律，以氣化之常來導正氣化之變。就因人是具有仁、貪二性，也就具有善質與惡質，所以不能因人具有善質而稱人性為善，而是必須透過王道教化才能夠成善。董仲舒也站在孔子「上智下於不移」的觀念下，將人分為聖人、中民及斗筭之性，其中聖人與斗筭之性都是不可移的，故以中民之性為討論的重點，並強化君王與教化的重要性。這樣以陰陽之氣來說人性論，不僅對後世人性論的發展上有顯著的影響，也是前人在詮釋人性中所少有的。

近年來愈來愈多學者透過氣論來重新詮釋早已熟知的古代聖賢，而董仲舒的氣論也多受學者關注，如陳福濱、孫長祥、張立文、周桂鈿等人皆對董仲舒氣論有所研究。而筆者則以前人的研究成果為基石，透過氣論的特殊性來對董仲舒的「宇宙論」、「天人感應」、「人性論」重新加以梳理，以凸顯出董仲舒氣論欲表達出形上、形下是一的氣化整體觀，以及董仲舒在漢代氣論「貫通天人，包羅萬有」的精神下，具有承先起後的重要地位。

¹⁸ (漢)董仲舒：《春秋繁露·卷一·玉杯》，頁8。

